

明清王朝之一角 東西交融之中心 ——湯開建講述「澳門學」研究的心得

經過了六年的努力，參考數百種東西方語言文獻、有200餘萬字的《天朝異化之一角：16—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》（以下簡稱《天》）一書終於經暨南大學出版社出版而在不久前與讀者見面。作為該書作者的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湯開建，在接受本報記者獨家專訪時表示，《天》的發行，是澳門研究的一大成果、一大突破，也是認識16—19世紀東西方交流的重要文獻。他向記者講述了自己從事澳門研究的種種心得，以及對歷史的分享。在他看來，澳門雖小，但卻是解讀東西交流史時不能忽略的一座城市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

因為其在中西關係及天主教研究領域的突出成就，湯開建曾在2008年獲得了「法蘭西文化教育騎士勳章」。他說，《天》這套書的出版，其實是從九十年代已經開始，當時主要研究西洋科學技術、西洋教育、西洋音樂美術在中國的傳播這些專題，在澳門史研究過程中又積累的一些新的資料，並加上自己對西洋文明在澳門傳播的全面認識而形成的新成果。他覺得，自己一直都想利用澳門學所獨有的極為豐富的16—19世紀葡萄牙語文獻去把握澳門西洋文明的樣貌，為此他耗去了極大的人力、物力與財力。而曾作為東西方文化交流橋樑的澳門，究竟還留有多少西洋文化色彩，也成為了研究動因之一。由此，他向記者分析了研究澳門的三個視角。

視角一：管治澳門的葡萄牙由盛而衰

在澳門的林則徐紀念館外的浮雕上，有這樣一個畫面：葡萄牙人向前來巡視澳門的林則徐鞠躬致敬。這個非常獨特的歷史場景，如今以藝術的形成被永久保留了下來。在湯開建看來，這個場景是真實的。因為，當時的葡萄牙已不再是15-16世紀時期的海洋強國，到19世紀中期已經變成了一個西洋弱國，和彼時強大的英國難以相比。即使當時居住澳門的中國人，也看出了這一點，不少人是看不起衰落的葡萄牙人的，只是將他們當作是租居在澳門的外國人而已。湯開建說，這從葡語的推廣遭遇便可窺見一斑。

葡萄牙人在澳門也曾經力圖推廣過葡萄牙語，早期在澳門的基督城內還是成功的。但是，隨著葡萄牙的衰落，強勢英國的崛起，當時的中國人覺得沒有必要去學習它的語言。事實上，當時管治澳門的葡萄牙政府也已經處在衰微的狀態之中。所以，他們對明清政府的態度也一直未採取強硬方針。

從澳門史的角度看，湯開建認為，澳門作為與中國古代傳統社會政治相異化的地方，一個非常突出的表現便是議事會的存在。這是當時的葡澳當局用以管理澳門的一個重要機構，具有代議政治的色彩。不僅如此，當時負責與中方官員接洽的機構，也是議事會。可見，議事會在澳門歷史上具有非常獨特的地位和作用。而如今，漫步澳門，除了葡語式的街道名稱、林立的天主教堂、葡萄牙風格的建築、葡國餐等生活文化層面的因素，似乎難以在普通澳門人（土生葡人除外）的生活中尋找到過往的葡萄牙因素。這便是葡萄牙對澳門管治的弱國政治的一個表現。

視角二：大航海時代東西方貿易的樞紐

明清時代，當時的朝廷時常奉行海禁政策，禁止國人與外界進行貿易往來。不過，這樣的海禁政策之下，澳門卻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例子。特別是在清代，鴉片戰爭之前，或者說在整個大航海時代，澳門在東西方貿易中，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，是不能夠忽略的



■ 負責與澳門進行貿易的廣州十三行



■ 澳門東望洋燈塔，是大航海時代貿易的象徵



■ 水舞間表演，展現今日澳門作為旅遊文化城市的魅力

貿易樞紐。湯開建說，當時在澳門，存在着從事商務活動的買辦、翻譯階層。這些人的出現，完全是經濟貿易活動之下催生的產物。

在澳門博物館中，有一幅澳門鑄造廠的圖景畫，便是對火炮鑄造的描繪。講解員會告訴參觀者：大炮曾經是澳門的「特產」。透過澳門的貿易管道，當時的晚明政府獲得了一些澳門的軍事裝備，其中就包括大炮。澳門與中國內地的貿易方式，據湯開建介紹，有兩種方式。一是「上省」、這裡的省，是指廣東省會

廣州，乃是十三行所在地。葡萄牙商人可以前往廣州從事貿易活動。另一種方式稱之為「下澳」，當海上局勢緊張時，中國官方便會禁止葡萄牙商人前往廣州，而是由廣州的商人前往澳門從事貿易活動。從這一點，也能夠看出彼時的中國政府，對澳門具有某種形式的控制力。

澳門作為貿易樞紐地位發生改變，逐漸走向衰勢，乃是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後期。湯開建直言，從根本角度看，這是西方列強強弱地位易手的結果：英國開始了擴張。由於英國的擴張，中英之間爆發了鴉片戰爭。而戰爭的結果是，《南京條約》不僅使得當時的清國割讓了香港島，也增加了中國沿海的五個通商口岸城市。通商口岸的增加，使得澳門的橋樑地位漸漸消失。湯開建曾統計過五口通商前後的西方國家登陸澳門的人數，從結果上看，已經大幅下降，五口通商之前大量的西方人進入澳門，而之後所見到的只是零零星星。原本前來澳門的商務船隊也消失了。不僅如此，原本在澳門設立的洋行也紛紛外遷。這對澳門的社會形態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。湯開建告訴記者，澳門博彩業的興起，便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。

視角三：東西方文明交流的窗口

湯開建覺得，總結澳門在西學東漸歷史上的地位，不能夠忽略早期天主教會的傳教士發揮的重要影響力。由於葡萄牙是一個天主教國家，因而天主教的傳播也透過澳門進入了中國內地。隨之而來的，除了宗教，也包括西方的技術、人文、思想等諸多產物。在澳門著名的大三巴牌坊一側，便有一尊利瑪竇的銅像。由此可見，傳教士在這一進程中的重要性。

當時的傳教士幾乎都是從澳門進入了中國內地。這批傳教士（例如利瑪竇）對中國當時的社會發揮了不小的作用。不過，湯開建也告訴記者，明清兩代政府對傳教士採取的態度略有不同。就明朝而言，晚明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，外來的白銀可以彌補中國白銀的不足，而軍事上則需要西方裝備，所以需要澳門這樣的窗口，因而傳教士也得以順利進入中國內地。加之當時的中國知識階層較為接受天主教，所以傳教士在宮廷和民間得以活動。但是清代是新興王朝，對國家社會具有很強的控制力，不具有需要外來文化的迫切性，主要着眼的是對外來文化的利用，因而傳教士入華主要是為宮廷服務。

到了晚清，中國的國力已經漸漸衰敗。湯開建認為，澳門成為了中國士大夫階層中的開明人士



■ 澳門的哪吒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體現



■ 《天朝異化之一角：16—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》

■ 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湯開建

認識和觀察西方世界的窗口。例如林則徐，為了備戰和搜集西方訊息的需要，便由其幕府的成員在澳門完成了著名的《四洲志》。而澳門本身，也具有被稱之為「舌人」的成批化的翻譯群體。湯開建說，這個群體的華人，不少來自廣東、福建和浙江。由此可見，澳門在東西方文明交流中，地位非凡。



不可忽略的日本因素

既然澳門曾經是東西方貿易的中轉站，則另一個東方國家——日本，在澳門歷史發展進程中的角色，便不能夠被忽視。湯開建說，日本與澳門的關係非常密切，這在經貿活動以及文化交流中都可以找到印證。據湯開建介紹，明代，生活在澳門的葡萄牙人較為富裕，一個很大的財富收入便是來自於對日本的貿易。在十六世紀的中葉，葡萄牙與日本之間的貿易往來，最為重要的中轉站便是澳門。當時的日本，需要的中國商品也是從澳門中轉；而中國需要的則是白銀。就這樣，澳門在當時的中、日、葡三國商貿中，發揮了獨特的作用。

而在文化層面，透過澳門，葡萄牙也對日本發揮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力。湯開建告訴記者，在日本，有一種被稱之為南蠻屏風的漆器，便是來自於葡萄牙。而思想文化交流的頻密更是這一時期日本與澳門之間往來的特徵。湯開建表示，作為海洋國家的日本，透過澳門獲

取外界訊息的態度，較之於當時的中國，顯得更加主動，不少葡文文獻被翻譯為日本語。而後來的荷蘭傳入日本的「蘭學」，更是成為了日本思想近代化的開端。

反觀中國，湯開建認為，明代後期部分接受西學的知識分子，開始了與傳教士合作的翻譯與介紹西方文化的運動，但這一種翻譯大多都是停留在西方人口譯、中國人筆述的層面上，而這種翻譯也僅出現於中國內地，並未出現於澳門。在澳門雖然始終存在着一個翻譯群體，但是將中文翻譯為外文的案例較多，而將外文翻譯為中文的案例很少。他認為，這種現象的出現首先是當時的西方對中國的認識有迫切的需要，故傳教士將介紹中國視為使命；其次則為當時的中國人對自己所具有的文化優越感有關，知識階層認為沒有必要引入和學習西洋的思想文化。歷史發展的軌跡自此出現了分野。

文、攝：徐全



■ 利瑪竇是早期透過澳門前往中國內地的傳教士。

中國近現代史的鏡子

今天的澳門是作為旅遊城市和賭城的形象出現的。但是在歷史上，澳門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一面鏡子。湯開建認為，澳門開埠，經歷了四百多年的歲月滄桑，其近現代歷史的痕跡和意義，尤為值得今人去研究和發掘，這對於了解澳門歷史有着極為重要的作用。

湯開建向記者表示，在近現代中國的動盪歲月中，澳門是一個不能夠被忽略的名字。孫中山出生在廣東的香山，這是一個距離澳門很近的地方。湯開建說，孫中山經常去澳門，可以說，澳門是孫中山革命啟蒙的地方。孫中山也曾在澳門一邊行醫一邊搞革命，後來，這裡便成為支援革命黨起義的後方基地和革命者的避難所。

除了革命黨之外，清朝末年戊戌變法中的改良派，也與澳門有着非常重要的歷史淵源。湯開建直言，澳門曾經是整個保皇黨的大本營。據檔案文獻記錄，戊戌變法失敗以後，幾乎所有的改良派要人彼時都曾避居過澳門。1900年



■ 清政府的新式陸軍火炮，但仍未能阻止清廷現代化努力的失敗，引發革命浪潮。

保皇黨發起的勤王運動，從澳門運進內地的快槍就達26,000桿之多。清廷甚至曾經試圖引渡避居澳門的改良派人士經元善，但在澳門獲得了保護。當時作為改良派首領的康有為、梁啟超，更是在澳門創辦《知新報》，成為晚清改良派三大報紙之一。而在澳門本地，對於中國近代思想界產生重大影響的思想家鄭觀應便是出生在澳門。可見，澳門的歷史，見證了近現代中國的滄桑，是中國近現代史的鏡子。

文、攝：徐全